

李少先主编

中国教育名人
传略

周谷城题



辽宁大学出版社

4
)

87
K825.4
107
二:2(1)

中国教育名人传略

现代第一分册

李少先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B 130755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 青 海

王 守 谦

李 世 邦

徐 树

滕 吉 海

中国教育名人传略

（现代第一分册）

李少先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三段四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沈阳矿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5

字数230.000 印数1—10.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7429·001 定价：2.00元

為師重友

董純才

一九八五年七月

编写说明

一、编著本书的目的在于向广大读者介绍我国教育界著名人士的生平、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以促进在全社会造成浓厚的尊师重教的风气。

二、本书编者自1980年起广泛搜集资料，做了一定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着力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评价和介绍教育界著名人士的生平、教育活动、教育理论和贡献，力求材料翔实准确、语言简洁朴实。但由于资料搜集工作范围广、难度大，不少重要的、著名的教育界人士的传略资料不全，或者来稿较晚，本册没能编入，将在以后各册收录。

三、本书体例，包括古代和现代两部分，分册出版。现代部分先分若干册印行，最后出版合订本。目录编排，以人物的生辰先后为序。

四、本书编写过程中，曾得到许多有关单位、团体和领导同志的关怀和鼓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教育家马寅初先生生前对本书征求意见稿表示称赞。教育家陈鹤琴、叶圣陶、吴贻芳、成仿吾、董纯才等对本书编辑工作给以各种形式的支持和指导。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五、由于编者水平和条件所限，本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来信迳直寄给沈阳市755信箱李少先同志。

编者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蔡元培		(1)
张 澜		(12)
李登辉		(23)
陈嘉庚		(29)
张伯苓		(36)
徐特立		(43)
黄炎培		(51)
吴玉章		(58)
陈 垣		(67)
马寅初		(75)
马约翰		(80)
李建勋		(84)
马叙伦		(90)
许崇清		(96)
陈中凡		(100)
林砺儒		(109)
李四光		(114)
李 达		(122)
陈望道		(129)
陶行知		(136)
陈鹤琴		(144)
廖世承		(153)
吴贻芳		(160)
舒新城		(164)
孟宪承		(171)

叶圣陶		(177)
杨贤江		(182)
杨石先		(188)
刘泽如		(194)
赵乃抃		(199)
成仿吾		(205)
车向忱		(210)
周谷城		(216)
陶淑范		(222)
刘绍禹		(228)
王 力		(233)
周贻白		(238)
王亚南		(241)
孙敬修		(248)
江隆基		(250)
傅任敢		(255)
匡亚明		(262)
戴伯韬		(267)
朱智贤		(273)
丁浩川		(277)
斯 霞		(286)



蔡元培

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民主革命家，我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先驱。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生于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逝世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

蔡元培的父亲蔡光普是钱庄经理，叔父蔡铭恩为举人。蔡元培十岁丧父，幼年在叔父指导下读书。一八八三年入学补诸生，后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一八八九年、一八九〇年连中举人、进士，一八九二年为翰林院庶吉士，一八九四年任编修。

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后，蔡元培开始接触西学。一八九八年变法维新运动中，他同情维新派。戊戌政变后，他认为维新派“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固，不能不情见势绌”。于是，他由北京回到绍兴，决心兴办教

育，培养人才，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他进一步认识到清廷腐败，开始倾向反清革命。同年，他到上海，曾任爱国女子学校校长，兼任中国教育会会长。一九〇二年在日本游历时，结识了一些旅日的中国革命者。同年秋天，他在上海创办了一所新学校——“爱国学社”。他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并且在校内进行军事训练。爱国女子学校和爱国学社，是当时中国两所最进步的学校。一九〇三年冬，他参与创办《俄事警闻》报（后改名《警钟》报），反对帝俄侵略我国东北。一九〇四年冬天，蔡元培与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反清的革命组织光复会，被推举为会长。一九〇五年，蔡元培经何海樵介绍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并担任上海同盟会分部主盟员。

一九〇七年他留学德国，在莱比锡大学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和心理学，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很深的影响。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蔡元培回国。一九一二年一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时，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之后蔡元培又任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这段时间虽然不及一年，但在他的倡议和努力下，废除了清朝遗留下来的封建教育制度，初步建立了我国的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体制。这是我国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开端。同年七月，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愤而辞职，又到德国留学和考察，在莱比锡大学听课，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一九一三年夏，曾因宋教仁被刺案一度回国。同年秋去法国从事著述，著有《哲学大纲》、《石头记索隐》等，并参加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了“华法教育会”。

袁世凯垮台后，一九一六年冬蔡元培回国，十二月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一七年一月四日到校视事。

当时的北京大学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校风非常腐败。不少学生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一心只想升官发财，混资

历，找靠山，整天游荡；教员中也有不少人学无术，吃饭混日子，讲课是陈陈相因，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了事。

革命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改革教育的要求，蔡元培本人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丰富的学识，以及他对教育事业的热忱、革新的勇气，这些方面的结合，促使蔡元培下决心对北京大学进行整顿和改革。

首先整顿和充实了教师队伍，改革了领导体制。蔡元培主张“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他聘请了《新青年》主编、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其他如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也都在北大文科任教。理科也聘请了许多知名教授，如李四光、颜任光、任鸿隽、李书华等。在法科教员中，象马寅初、陈启修也是知名的学者。他还裁减了一批不称职的本国和外国教员，对教员中的陋习也进行了改革。如许多教员盲目崇拜西方，鄙夷祖国文化，在课堂上用外国语讲授。蔡元培极力反对这种风气，明确要求除外国语文课外，其他课程必须用祖国语言讲授。

教师队伍经过整顿和充实，面貌为之一新。据一九一八年统计，全校教员中，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甚至还有二十七、八岁的教授。他们的思想多数倾向于革新，使学校开设了许多反映新文化新思想的课程，极大地提高了学术水平。

在北大领导体制改革方面，蔡元培建立了必要的机构和规章制度。这主要是建立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大评议会曾多次发表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宣言，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过学生运动。此外，还设立了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的行政机构。一九一九年四月，废各科学长，成立教务处，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同时成立总务处，管理全校人事和财政。各系成立教授会，规划本

系的教学工作。这些领导体制的改革，贯彻了教授治校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对于加强全校管理、提高行政效率，促进教学和学术繁荣，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其次，采取措施，保证学生智育、德育、体育的全面发展。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讲就号召学生不要追求升官发财，要求以“研究高深学问”作为自己的“宗旨”。他极力提倡男女同样有受教育的权利，不顾守旧势力的责难，招收女生。这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为了让更多的人有受教育的机会，他还积极提倡平民教育，鼓励学生举办平民学校、平民教育讲演团、校役夜校，还改革了招生制度，坚持以学业成绩优劣作为录取学生的标准。同时学校还允许有一定数量的旁听生。当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工农大众是有可能进入大学听讲的，旁听生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这对于改变北大学生大多数是地主、官僚和富商家庭出身的状况，是有进步意义的。这种旁听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革命者或学术人才。蔡元培也十分重视学生的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提倡学生全面发展。在他的倡导下，学生成立了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等组织。音乐研究会后改为音乐传习所，作为正式教学机构，他自己兼任所长。他还大力提倡体育，并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第三，培养和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研究空气。改革后的北大，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术讨论、思想争辩之风极盛。各类学术、政治团体和各种刊物相继创立。著名的社团有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进德会、地质研究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雄辩会、孔子研究会、数理研究会、世界语学会、技击会等。学校里许多主张社会革新进步的社团和刊物，都程度不同地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和帮助，这些进步的社团和刊物，是“五四”时期北大新文化营垒的主要力量。

通过上述各方面的整顿和改革，北京大学在“五四”前后已逐步完成了向近代资产阶级大学的转变。在新文化运动中，在伟

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北京大学所以站在斗争的前列，除了其他条件以外，与蔡元培主持的整顿和改革工作是分不开的。这时，蔡元培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赞成文学革命，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旧思想，提倡以科学和民主为内容的新思想。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在天安门讲演大会上，他发表了《劳工神圣》的演说。他说：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他热情地喊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劳工神圣！”这里所指的劳工，虽然还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但他从旧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直观地认识到脑力劳动也是属于劳工的一部分，特别是热情歌颂包括工农在内的劳工，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新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保护者的蔡元培，自然也成了封建势力攻击的一个目标。一九一九年三月，封建卫道士林琴南带头发起对新文化运动、对北京大学的进攻。他在《公言报》上发表了给蔡元培的公开信。他还直接插手北大，指使落后学生张某多次给京、沪报刊写通讯，散播陈独秀等被逮捕、被逐出北大的谣言。同时北京军阀政府指使议员在国会提出所谓弹劾教育部的议案，实际是压蔡元培辞职。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发表了《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对其谬论进行了反驳，重申了言论自由、百家争鸣的原则。虽然比较温和，但是他为宣传“过激之论”作了辩护。这里所说的“过激之论”，是指当时反动派和封建余孽所强烈攻击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在当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林琴南等人所散布的谣言，蔡元培也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他先在报上发表声明，否认有驱逐之事。随后写信教育那个投靠林琴南的落后学生。鉴于张某不肯悔改，乃决定出一个布告，令其退学。这个布告把林琴南等反对北大、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阴谋暴露在全校师生面前，给予了沉重打击。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是不很赞成的，但他对学生的政治活动并不多加干涉，而他自己的思想也是随着时代前进的。一九一八年五月，北京学生举行过一次反对军阀政府的请愿游行，蔡元培曾劝阻北大学生参加。但当“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他挺身而出，同情、支持并保护学生运动。五月四日当晚，他参加了北大学生讨论营救被捕同学的大会。五日，他和六校校长一起，前往总统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当天在北大召开的十四校校长会议上，蔡元培和与会者不顾教育部下达的将“闹事”学生一律开除的命令，提出应释放被捕学生，如政府不接受，全体教职员即一律罢职。五月六日，蔡元培到警厅以身家作保，要求释放学生。在广大爱国师生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压力下，反动当局勉强同意释放学生。七日，蔡元培和全校师生一起，热情迎接被捕同学回校。

蔡元培的正义行动，遭到反动政府的仇视。五月九日，当局连下三道命令，其中一道是要查办北大校长。这个命令虽然中途收回了，但实际上已内定撤换蔡元培的校长职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于五月十日辞职离京。驱蔡还是挽蔡，成了当时爱国学生运动与北京军阀政府斗争的焦点之一。学生们挫败了反动政府的种种阴谋，九月，在师生的欢迎下，蔡元培返校复职。还在七月二十三日他离京以后，曾发表了一篇《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对学生的爱国斗争和爱国精神给予很高评价，一面又认为救国运动已经完成，劝学生“力学报国”。蔡元培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思想是随时代前进的，但他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教育家，他的思想局限是可以理解的。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对反动军阀政府的统治越来越不满。一九二〇年四月，他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用洪水喻新思潮，猛兽喻军阀，呼吁“驯伏猛兽”，希望“洪水”能冲破一切坏习惯。同年冬，他赴欧美考察教育，一九二一年回国。回国后看见“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十分愤懑。一九二二年十一

月反动政客彭允彝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北京学生爆发了“驱彭”的斗争。蔡元培站在学生一边，发表了《关于不合作的宣言》。愤于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七日他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未经批准，即离京南下。他在“辞呈”中痛切陈词，抨击了军阀统治的黑暗政治。他的这次辞职，在北大又引起“挽蔡驱彭”的一次大的斗争。蔡元培决心不与反动军阀政府合作，同年七月重赴欧洲。由于师生们挽留，这时他在名义上仍作北大校长的职务，后来直到一九二七年才取消北大校长名义。一九二三年蔡元培到德国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这一年“五卅”运动发生，国内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斗争高涨。八月他在欧洲一些报纸上发表《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说明惨案真相。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孙中山提名，蔡元培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这时他尚在国外。一九二六年二月回国。七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蔡元培参加了北伐，在江浙一带从事组织工作。同年冬，他任浙江政治分会委员。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蔡元培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一度站在蒋介石方面。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在南京成立蒋记国民政府。蔡元培到南京，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大学学院院长。一九二八年又任南京政府常务委员、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到了一九三〇年九月，在北大师生的要求下，蔡元培曾同意担任北大校长职务，并定于九个月之后到校，但由于这一年底他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便不再担任北大校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蔡元培主张对日抗战。他对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专制的反动政策十分愤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他同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一起发起并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他与同盟的成员一起，

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情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他为营救被捕的革命者爱国者奔走呼号，不少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曾因此得到保护，为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保存了许多力量。

蔡元培与鲁迅的关系比较密切。鲁迅曾几度在他主持的部门中工作。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蔡元培与宋庆龄等组织治丧委员会，亲为执紼送殡。后来又为《鲁迅全集》作序，尊鲁迅为“新文学的开山”。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淞沪沦陷后，蔡元培由上海移居香港。原打算转桂林或昆明，但因多病未能成行。此时他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表示高兴。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中共中央发出了唁电，指出：“先生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他的逝世是中华民族的损失。

蔡元培的一生，由于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局限，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和错误，但是他不愧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为中国革命做了许多好事，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和总结。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和道德教育

蔡元培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发表了有名的《对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五种教育，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他认为这五种教育都是需要的，但是他对世界观教育特别注重，他说“惟世界观及美育……鄙人尤所注重”。所谓“世界观教育”，就是要遵循世界进化史指示的途径使人的“通性”——“意志”能够获得最大的自由：一方面，

“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着”，使每个人的思想言论有完全的自由；另一方面，“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行于领悟”，获得意志的完全的自由。

蔡元培把培养“自由意志”作为世界观教育的目标无疑是受了康德思想的很大影响。

他认为世界观教育的主要方法，就是他所努力倡导的“美感教育”。他说：“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

（《蔡元培选集》第331页）特别是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明确反对学校开设神学课程和举行宗教仪式活动。当时中国教育对美育的重视是不够的，尤其是帝国主义者正利用基督教疯狂地进行文化侵略，蔡元培响亮地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打击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凶焰，这在当时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的，是有进步意义的。

蔡元培对世界观教育的注重是值得重视的，但是他的世界观教育的基础是唯心主义的。这反映了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

早在辛亥革命前，蔡元培对德育问题就非常注意。一九〇七年在德国留学期间，他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了《伦理学原理》等。一九一二年七月，他在北京“临时教育会议”的演说中，论述了他的五种教育的关系，说“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肯定地把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中心。他认为培养坚强的自由意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道德教育最高目标。平等互助，亲爱合作是道德教育最主要途径。这些都是符合于资产阶级要求的，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也有它反帝反封建的积极一面。

关于德育的方法，他反对呆读死记道德格言的教育方法，主张道德教育重在实行。他在任北大校长期间，曾发起并组织了一个以砥砺个人德行为宗旨的进德会。这个组织在校内外颇有影响。它的宗旨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它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旧社

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腐朽的不满，对北大部分知识分子个人道德的提高产生过较好影响。

2、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

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曾努力实施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一九三七年，他总结多年教育经验，发表了《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表面看来，他的这种主张好象客观中立、不偏不倚，实际上他是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文化堡垒里争夺地盘。因为封建文化思想在北大本来早已存在而且到处泛滥，并不发生“容”和“包”的问题。只有资产阶级的“新学”，才要求“容”和“包”。他本人曾明确表示对“新派”的支持，说过“我敢断言，白话派将来一定占优胜”。所以，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只能是为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开拓道路。

在蔡元培看来，“大学是包容多种学问的机关”，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所以他珍惜人才，注意发挥教员的专业，对于教员中的不同学派，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允许自由争鸣，让学生自由选择。他认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蔡元培的这种“兼容并包”的思想，对于北大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术的繁荣，曾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兼容并包”，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例如，从一九二〇年起，李大钊在北大正式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课程和讲座，这在我国大学里是破天荒第一次。

3、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主张

他在一九一八年所发表的《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中主